

导 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的增长与发展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问题，因而也自然成为经济史研究的主题。对于不发达国家而言，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尤其希望弄清楚，他们在增长的引擎和增长的格局上出了什么毛病，从而寻求一种适合其国情的发展模式。

中国近代 特别是 20 世纪前半期的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立的基础和起点。因此 对其发展状况、达到的水平、性质、特点，以及发达与否原因的科学分析和正确认识，对于总结新中国成立 40 余年来经济成长的得失和当前经济改革方案的选择是否合乎国情，不仅可以提供历史的依据和借鉴，而且具有理论的和现实的指导作用。

—

长期以来，对旧中国经济的研究，在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这一学科领域中，由于受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影响，只把生产关系发

展变化的历史作为研究的对象，忽视、甚至完全抛弃了生产力的研究，又由于对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论述的片面理解，也忽视了对流通、分配、消费等方面的研究^②。一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被囿于几种所有制及其相互关系变化的狭隘空间。各种经济史教材中大多数按照所有制关系将中国近代经济分割为几大块：即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官僚资本主义经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农村的封建地主经济、新民主主义经济等。从而割裂了经济统一体内部事物之间的联系，片面的从生产关系的角度，过分夸大了他们之间的差异和矛盾，而忽略了他们之间的同一性。以至对百余年间中国经济总的发展状况没有总体的分析。经济增长的速度和周期性的波动、各时

① 5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史学界关于经济史研究对象的主导意见来源于前苏联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但据笔者所见，前苏联学者中尽管有一部分人主张这种观点，但持异议者也大有人在。很多前苏联出版的经济史著作始终将生产的发展状况作为主题，并在某些领域的研究中颇有建树。

② 马克思主张把生产、流通、分配、消费作为一个经济统一体中互相联系的要素来加以考察。按照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的论述，生产关系的总和应当包括生产关系、流通过程、分配关系和消费关系。其中生产关系处于支配的地位。生产关系不仅包括生产工具的分配，还应包括社会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这种分配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并且决定生产的结构《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33—162页）马克思从来不曾把生产关系简单地归结为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他认为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 and 改变的。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为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雇佣劳动与资本》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487页）。

例如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对外国资本主义在华设立的企业和中国资本企业、中国资本企业中的国家资本企业和私人资本企业加以区别是必要的，这是对旧中国国情认识的深化。为此，本书设有专章讨论我国国民经济在近代化过程中所有制结构的变动。因为他们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作用是不尽相同的。但这三种形式的企业，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同属资本主义经济性质；从生产力的角度看，则均为近代生产。忽视他们的共性显然是片面的。因此本书另设有章节讨论他们作为传统（旧式）生产的对立物的出现和成长壮大过程，以阐明中国产业结构的变化。并在有关所有制结构变动的章节中，把他们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水平。

期的生产发展水平、技术进步的作用、国民经济各部门结构的变化、国民财富和收入的分配——消费和积累的一般趋势等一系列在近来世界各国经济史著作中都被当作主要内容的重大课题都很少有人、甚至无人问津。另一方面 由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未能摆脱通史、革命史结构的模式 在时期和章节的划分上以政治事件的发生和政治形势的变化为转移，无视其特定研究对象自身的发展状况和规律 往往陷于削足适履的难堪境地。这就不能不使从事现实经济研究而希望了解历史的学者，乃至任何一个普通的中国经济史读者感到失望 因此研究并回答这些问题 克服旧体系的缺陷 是中国经济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在这方面 发达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史研究已经走在我们的前面，因此我们必须努力改变这种落后的状况。

这些不曾被认真研究的重大课题，在迫于制定战略和策略的需要而必须作出回答时 从理论和政治形势出发 主观的臆测和论断往往应运而生。在革命战争时期 由于资料的缺乏和研究条件的限制出现这种情况往往难以避免，遗憾的是时过 30 余年 环境已经有了根本的好转 许多经过努力理应纠正的错误观点 仍被视为不容置疑的定理广为流传。如现今各种论著和教材中论及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时认为：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影响，封闭起来 中国也将缓慢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 中国农村的自然经济基础已经破坏 土地日趋集中 农民的土地税负担不断加重 为世界各国中所仅见 国民财富和收入的分配越来越不平等，中国广大人民日益贫困化 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一天天走下坡路、陷于破产和半破产的境遇（抗战前）中国是外国投资者的沃土 外资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势力不断扩张；帝国主义到处致力于保持资本主义前期的一切剥削形式 并使之永久化 中国近代国民经济日益衰退 及其外因为主论等等 概属此列。究其原因 除前面已经提及者外 确实尚有以下两个方面：（1）从先验的观念出发，摘引关于局部地区或

企业的文献资料，推论全国，以短时间内的静止孤立研究取代长期的动态分析，在缺乏宏观统计计量的情况下，即作出质的结论。比如摘引几个企业一段时期中工人名义工资的资料，即作出旧中国工人生活绝对贫困化的论断。引述一些县、乡、村十数年间土地分配的资料就作出旧中国农村土地日趋集中的结论。这些都是革命导师列宁早已批评过的，是研究问题的错误态度和方法^①。(2)盲目地接受国外学者以及我们国内某些学者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的曲解，将他们从来没有说过，甚至与他们论述相反的观点，以“发展”和“联系实际”的名义冠之以“马克思主义”的定理并以之作为一种先验的原则，指导各个范围的研究工作。是非标准的权威观和传统观，磨灭了几乎两代经济史学工作者的理性判断能力。

尽管是一种对历史认识的错误，却使我国的经济建设和发展受到巨大的损失，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例如，马克思在他有关中国的论述中多次指出，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的主要特征是家庭农业与手工业结合的自然经济，这种状况直到全国解放以后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由于对旧中国农村经济落后原因的片面理解和对商品经济发展程度的错误估计，盲目地作出自然经济的基础已经破坏的结论。在大陆上实行了土地改革以后，举国上下大都认为，地权问题的解决，标志着反封建任务的完成，实际上却忽略和违背了马克思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科学观察和正确认识。殊不知不发达的商品经济与落后的生产力互为因果，不彻底摧毁自然经济的基础，大力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通过市场上的竞争和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使生产社会化，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农业生产力的落后状况，更无现代化可言。早在1776年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就阐述了专业化、分工和交换带来的巨大效率，指出解放

^① 社会生活现象极端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列宁选集》第2卷，第733页，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出竞争的利润动机的极端重要性。在商品经济尚未充分发展的情况下，匆匆实行计划经济，加速推行农业集体化并不断提高公有化的层次和规模，显然不具备马克思关于由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转变的前提条件，社会主义经济理应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基础上的计划经济，而不应是自然经济基础上的计划经济。其结果是严重束缚、甚至破坏了农村生产的发展，使我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长期徘徊在一个低水平上。时隔 30 年，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以后，才使我们对历史和国情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①。承认发展商品生产是我国农村经济现代化过程中一个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

80 年代以来，对旧中国经济研究的上述缺陷逐步为多数经济史学工作者程度不同的有所察觉，反对将生产力作为经济史研究对象的一个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的学者也已为数不多。十年浩劫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阻碍我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主要在内部，而不在外部。近十余年来，在传统社会经济结构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和近代化的束缚、各个历史时期农产品商品化的程度和增长速率的估算、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趋势（特别是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些有代表性年份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估算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进展。最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可举出吴承明先生的论文集《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②和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③以及陈振汉先生的论文《我国历史上国民经济的发达和落后及其原

解放前，我国农村产品的商品率不足 30%。到 1981 年，我国农产品（包括农林牧渔和大队、生产队副业的产品）商品率也只有 40% 略多一些。参见：《中国统计年鉴》，1981 年，第 134、341 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年版。

③ 第 1 卷，人民出版社，1985 年出版；第 2 卷，1990 年出版。

因》^①。

50年代,中国大陆曾出版了一些有关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统计资料,其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由于受“左”的思潮影响,经济史著作往往只讲生产关系,不讲生产力。各个历史时期生产发展的速度和水平可谓不见“经传”。读了一本讲述中国经济史的书,却不能得到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情况的基本轮廓。写作者既不曾深入研究,读者自然更不得要领。

近几年来国内经济史学界一些有识之士提出对中国近代的经济发展作系统的宏观的统计分析,但总的说来还停留在呼唤的阶段,成果可谓凤毛麟角。这方面,倒是在国外的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学者先行了一步,自本世纪60年代以来先后出版的著作有:刘大中、叶孔嘉的《中国大陆经济:国民收入 and 经济发展,1933—1959》(1965年)^②、费维凯的《中国经济,1912—1949》(1968年)^③、《中国经济,1870—1911》(1969年)^④及其为剑桥中国史晚清部分和中华民国部分所写的相应章节、张约翰译作章长基的《共产党中国以前的工业发展:一个数量分析》(1969年)^⑤、珀金斯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969年)^⑥、埃克斯坦的《中国经济的发展》(1975

① 载《中国经济史论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② Liu Ta-Chung and Yeh Kung Chia, *The Economy of the Chinese Mainland: National Incom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1933—1959*,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

③ Feuerwerker, Albert, *The Chinese Economy, 1912—1949*, Michigan Papers in Chinese Studies, No. 1.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68.

④ Feuerwerker, Albert, *The Chinese Economy, 1870—1911*, Michigan Papers in Chinese Studies, No. 5.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69.

⑤ Chang John K.,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Pre-Communist China: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Chicago, Aldine, 1969.

⑥ 中译本已于1984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年),^①珀金斯主编的论文集:《中国近代经济的历史透视》(1975)^②。此外在罗斯托著的《世界经济的历史和展望》(1978)^③和雷诺兹著的《第三世界的经济增长, 1850—1980》(1985年)^④等书中,也都有专门的章节论述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趋势,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状况进行比较研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最近美国匹兹堡大学经济学教授罗斯基的《战前中国的经济增长》^⑤一书的问世,无疑是在上述研究基础上的深入,其对本世纪早期中国经济的宏观统计分析,无论是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均有开拓性的进展。^⑥

西方上述研究成果虽然在说明中国近代经济增长的趋势方面取得进展,但由于资料的限制,对旧中国经济的许多重大问题仍然没有涉及。从相异的文化背景出发对中国复杂经济历史现象作某一层面上的观察,在结论上总不可避免的会有某种偏见和错误。

取近年来中外研究之所长,补其之不足,这是本书的编撰宗旨。本书撰写的原则是,以旧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周期、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国民收入的分配为主要研究对象,力图说明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经济机制和运行的内在特征,及其发展与否的原因。在叙述的方法上,采用从宏观到微观,从一般到个别的序列结

① Eckstein, Alexander,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5.

② Perkins, Dwight H., *China's Modern Econom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③ Rostow W. W., *The World Economy History and Prospect*.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78.

④ Reynolds, Lloyd G., *Economic Growth in the Third World, 1850—198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⑤ Rawski, Thomas G., *Economic Growth in Prewar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⑥ 但笔者并不同意该书的许多基本观点,详见《近代中国》第3期所载的书评:《对二十世纪前期中国经济发展的重新估价》。

构，在竭尽一切可以找到的资料基础上，力图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的各个方面，对中国近代的经济的发展作全面的考察。

二

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我们的眼力不够，需要借助于马克思主义的望远镜和显微镜。这句名言十分形象和深刻地阐明了运用先进的理论和方法在认识客观世界中的重要性。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是以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作为研究的典型，其对处于同一历史发展阶段的中国近代经济研究的指导作用是毋庸置疑的。《资本论》某些章节本身就是直接阐述英国的经济发展史，仅就其在近代世界经济史中的原型和作为比较研究参照系的价值而言也是不可忽视的。认真钻研他的著作仍然是我们今后长期努力的方向和任务，不可盲目接受国内外学者对中国近代社会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以致对他的学说只有肤浅甚至错误的理解。

在熟练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和历史唯物论原则的同时，不断引进世界各国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用于研究和分析我国的经济史也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只有借助于不断发展的理论和手段才能站得高、看得远、打开眼界、开辟研究的新领域和解决问题的新途径，提高经济史的研究水平，使认识不断深入，赋予这一学科以活力和生气。忽视理论对历史研究的指导作用，或在理论上固守前人的论断，不关注其发展和创新，则无异于作茧自缚，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做法背道而驰的。

建国以后，我们认为，历史学是一门科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西方则不然，考察一下西方的史学史则可以看到，历史学与经济学不同，它不属于社会科学而属于人文学科。然而，这种传统处在一个变化的过程之中。自本世纪 50 年代以来，历史学者

较以前更多地注重应用其他社会科学的范畴、理论和方法，从而使史学的研究走进一个新的天地。这种趋势——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以美国最为显著，特别是从本世纪 60 年代开始。

经济学理论的长足进展，使它走在其他社会科学理论的前面，从而为经济史研究运用这套理论提供了条件。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史研究有大量使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倾向的同时，经济学研究也有广泛运用历史分析的倾向。总的说来，这两个学科领域之间存在着一种互相融合的趋势。自本世纪 30 年代以来，经济学家关心的问题转向经济的增长和发展问题，从而导致了历史学与经济学更加接近和结合。因为要研究增长、周期、国民经济结构的变动、收入的分配等领域的趋势，就不能只观察短期现时的经济现象，而必须把目光投向历史，促使人们对经济发展的长期历史过程作系统的定量分析、研究。因为经济计量学研究中使用的数据是从观察已经发生过的经济过程得来的，所以计量经济学的方法也是一种历史的方法，而从历史研究的领域看则是一种经济学的方法。经济学家正是通过研究历史上发达的经济现象中各种参数之间的相互关系，归纳出一定的模式和变化的趋势。

近年来国外已经出版了一些向历史学界介绍经济学理论的著作。但其介绍的原理都比较浅显，作为入门虽然还有其价值，但对深入研究则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应当根据特定的研究方向的需要，在经济学的某些学科乃至社会科学中的某一种理论方面作较深入的钻研。我国对外开放以来，中外经济史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不断增加，在这一过程中，一些西方经济史学家批评我国的经济史学者只有历史编纂学的知识，而缺乏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专

如哈威克著的《历史学家所需要的经济学》(G. R. Hawke, *Economics for Historia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费雷德著的《向历史学家介绍计量的方法》(Roderick Floud, *An Introduction to Quantitative Methods for Historian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3)。

业训练 (Professional training)。^① 对于这种批评 笔者初始觉得似乎是张冠李戴。因为建国以来我国史学界历来是非常强调“以论带史”的，文献学和考据学的方法是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传统历史学的特征，这顶帽子是戴不到我们头上来的。进而考虑这种批评自有其来历，无非是指西方近半个世纪以来，在社会科学理论方面颇有进展 而其中的很多学科 如现代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等在我国则几乎空白了 30 年，理论的贫困和方法的陈旧是造成我国历史研究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前几年关于史学理论和方法的讨论不少。我赞成一些人的意见，即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使用不同的方法，也可以对同一对象采用不同的方法加以研究。中国史学界早就有“史无定法”的主张。因此，未可寻求一种万能的方法代替其他，片面的抑此扬彼，用简单的“是”与“非”加以评判。这将有助于史学的繁荣，也易于为大家所接受。一般说来，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和手段的产生，将有助于对历史现象认识的深化。我们要掌握人类复杂的经济发展历史，必须不断更新我们的理论和方法，但其运用的范围和层次总是有限的，任何一种新的方法，也不能希图用来解决全部历史问题。因此，旧有的方法仍有其存在的价值，就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史学界，也还有很多学者在继续采用传统方法进行研究工作。当然，在我们惯用和尚不熟悉的理论和方法之间，应侧重提倡引进和运用后者。譬如发展经济史学、计量经济史学、社会学、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等等。目前国内和国外都有一些学者认为前两种方法在西方已经渡过他们的黄金时期而趋向衰落（这些学派自己并不

^① 费维凯编：《从宋代至 1900 年的中国社会经济史，1980 年美国代表团参加北京中美学术讨论会报告》（Edited by Albert Feuerwerker, Chines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From the Song to 1900, Report of the American Delegation to a Sino-American Symposium, Beijing, 26 October—1 November 1980. Ann Arbor, Center of Chinese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2）。

这样认为)而后二者已经或者正在形成潮流。因此,一种‘迎头赶上’和‘超越’的主张在我们国家的一些学者的头脑中萌生。这种意见,窃以为不妥。如前所述,一种新的方法往往是应解决某一层次或某一范畴问题的需要而生,我们不去掌握它,将使我国历史研究中一些重要领域继续空白下去。以计量历史学派为例,其对美国经济史的研究取得显著的成绩,在对加拿大、英国、德国、日本等国以及加勒比、中东、印度、泰国等不发达地区和国家的历史研究中颇有建树。前苏联和波兰学者应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研究欧洲中世纪的社会结构也取得相当的进展。许多国家计量经济史学者所取得的成绩说明,同样的材料,在按照现代经济学的理论,采用计量的方法加以分析后,就会比以前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向前迈进一大步。而对中国近代经济史作计量研究的时代可以说刚刚开始,它需要在理论的指导下,按照不同的课题,发掘整理必要的资料,或对已有的资料加以重组和推算,在具备了基本构件以后,建立起各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模型,进而分析各种因素变动所产生的影响。

法国年鉴学派新一代历史学家勒普瓦,拉迪认为:无可计量的历史不能称之为科学的历史。近年来我国的一些经济史学工作者在论及研究方法时都一再强调计量分析的重要性。吴承明先生指出:“凡能定量者,必须定量”这就可以破许多假说,立论才有根据。^①笔者以为,对经济发展的历史,如果不能用明确的数字序列来加以表示和衡量,而只能用一些、较多、很多、几乎等不确切的概念来描述,那只能说明我们对它的了解是肤浅的,也就是说还没有进入科学的阶段。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理,量和质是对立的统一,不同质的事物具有不同的量的界限。一定的质必须以一定的量作为必要的条件,量变达到一定的限度,事物的质就会改变。量和质

《关于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意见》见《晋阳学刊》,1982年第1期。

是密切联系、不可分离的。经济发展史上各个阶段的划分，既有其质的规定性，也有其量的规定性，即生产力发展速度、水平等的规定性，对这些重要的具有决定性的因素不作数量分析，就轻率地得出带有质的规定性的结论，是违背唯物辩证论的基本原则的。我们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要力求改变过去那种举几条文字材料就得出一个结论的研究方法。早在40年代，毛泽东同志就要求我们做到胸中有“数”。他说：“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分析。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我们有许多同志至今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①我们的研究工作要尽快地摆脱毛泽东同志早已指出的这种错误倾向。

传统史学在方法上的一个致命弱点就在于完全依靠文献资料中对个别事物的记述或零星的数字，以举例说明的方式，然后加以概括，作出以偏概全或模糊不清的定性推断，在如何由个别上升到一般、由分散到综合、由微观到宏观的方法论上陷于困境。其结果往往是在没有弄清楚某一历史的实际状况到底如何，或在作出一种错误判断的情况下，却把主要精力放在解释其原因方面。即使是在结论正确时，这种原因的分析也往往停留在事物的表面，无法深入其本质，更不可能准确说明各种因素影响的程度和相互之间的关系。

自本世纪60年代在美国率先兴起的新经济史学派，即计量经济史学派，恰在解决上述一系列重要的研究范围的方法方面，克服了传统史学的缺陷。它按照经济学理论和范畴的需要，从经济分析的概念出发，发掘和整理资料，运用数理经济的方法对已经占有的原始数据加以重组和归纳，某些文献中没有直接计量而又必不可

^① 《毛泽东选集》第2版 第4卷 第1442页。

少的数据 则从已知的变量中 根据经济学学理 中已判明的函数关系加以推算,使之可以从宏观上和总体上来描述和认识经济历史发展过程的规律。如果数据齐备,还可以按照模式,用反事实度量的多元回归 对影响某一事物的各种内在因素作定量的分析 从而可以区别这些自变量对某一 因变量影响的相对重要性。从而开辟了许多过去无法进行研究的新学术领域,并可以检验以往历史研究中那些未经计量的定性判断,使那些符合或基本上符合实际情况的结论得到验证,将那些错误的结论加以纠正 并提出科学的新见解。

在计量经济史学家看来 按照研究对象的要求 对一些历史文献中没有(或根本不可能有)的序列数据 根据已有的数据间接加以估算或推算,不只是对历史认识深化的需要 而且是有充分科学根据的,这正是他们的优势之所在。比如美国新经济史学对 19 世纪美国国民收入、劳动力数量、农业劳动生产率、铁路的运输效率等的估算被认为是他们最有成绩的贡献。^① 日本是从 1925 年才第一次有了全国国民总生产的调查统计,日本著名经济学家大川一司依据在此之前关于收入税的历史资料将日本的国民收入倒推至 1878 年。^② 他的研究经过反复的检验被世界各国研究日本经济发展的学者所确认,也被日本各种官方出版物采用。

旧中国经济统计资料较之发达国家更为零散和缺乏,借鉴国外的经验和方法 在这方面经过实验做出成绩 理应成为我国经济史学工作者的奋斗目标 那种面对数据不足,在一些重大课题面前

① Lance E. Davis and Stanley Engerman, *Cliometrics: The State of the Science (or Is It Art or, perhaps, Witchcraft?)* Edit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Illinois, *Historical Methods*, Volume 20, Number 3, Summer 1987, P97—106, Chicago. 兰斯 E. 戴维斯和斯坦利·恩格尔曼:《计量历史学 科学的说明 或是一种艺术 或是一种魔术?》载《历史学方法》第 20 卷 第 3 号,1987 年夏 芝加哥。

② Ohkawa Kazushi, *The Growth Rate of the Japanese Economy since 1878*. Kinokuniya Bookstore Co. Ltd. 1957.

望而却步的状况必须改变。至于少数人视新方法为异端，在对其只有一知半解、甚至浑然不解的情况下，即盲目加以排斥的态度，更是不足取的。这里需要多费一点笔墨的是，我国史学界一些人长期以来对采用估计的方法持否定的态度，认为只有文献中有记载的方可使用，窃以为这种观念应当扭转。例如，中国历史典籍中有极丰富的人口资料，梁方仲先生将其辑入《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①一书。但人所共知，只依据这些原始记载，并不能用来说明中国人口变动的趋势，因为无论是包括的地域还是统计的范围和口径等方面历代均不相同，必须从多方面加以推算和修正。梁方仲先生自己首先撰文做过这样的工作。国外则有何炳棣先生做过同样的研究。^②他们的成果被经济史学者广泛引用。再如雷麦的《外人在华投资》一书中的数字，经济史学者无不加以引用，似乎写到书中的就是可信的。但对该书稍加研究就可以看到，雷麦的很多数据都是估算的。有些只是根据一两个企业的资料推算全部在华外资企业的情况。可是许多鄙夷估计方法的学者却加以引用而不予置疑，不能不说是一个十分奇怪的现象。当然这里所说的估计和推算，决不是凭空而来，而是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经过多方面的比较和验证，并注意其控制的极限，以使估计的数字更接近于历史的实际。

就本书的研究对象而言，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较之经济学的其他方面有更为直接的指导意义。因为旧中国的发展缓慢固然有其自己的特殊性，但应当看到不发展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问题，而不只是我们一个国家的问题，我们必须把它放在全球的环境中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作比较的研究。事实上，直到今日，经济落后的原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

② Ho Ping-ti, *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1953*,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因 不只是在中国得不到完整的解释 对其他国家来说也是一个众说纷纭的正在研究中的问题。另一方面,一些国家为什么会先发展起来 在西方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者看来 似乎是比较之不如发达更难以解释清楚的现象。因此关注发展经济学理论的进展 对于中国近代经济史这一个学科领域的研究工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就方法论而言 发展经济学大多运用比较的方法 在对世界做国别和区域性研究的基础上 比较其发展过程的异同 推导出各种增长的模式(不过这些著作中对中国近代经济的研究或者是空白,或失之于肤浅)因此将其得出的结论 运用于我国经济发展过程的研究 并检验其适用性和局限性 也是本书的一项任务。考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日本是欧美以外唯一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 其与中国在历史背景、近代化的起步的时间和起始条件、发展过程等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 所以本书在各有关章节中 较多地注意了以日本近代经济发展作为参照系,^① 以其作为在二元经济结构下获得迅速经济增长的范例 与中国相同阶段进行比较 这样有助于认识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特点及其得失所在。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新制度经济学(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诺思(D. C. North)的经济史理论,在国际经济学界和经济史学界引起一个不小的波澜 受到人们的注意 并且已经有人应用他的理论研究中国

作为比较的坐标系的选择是一个困难的问题。本书除以中国与日本的相同发展阶段作横向的比较以外,也在条件允许的地方与其他国家工业化的相应阶段进行比较。因为在西方一些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看来,日本的发展是一个例外,因此不宜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普遍尺度。

经济史。^①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这种理论更受到加倍的重视，大概是由于其对这些国家面临的现实经济问题的解决有益。近两三年来，诺思的理论也引起国内经济学界、特别是一些青年学者的浓厚兴趣。他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与罗伯特·托马斯合作）和《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相继被译成中文出版。这显然是与中国经济改革的客观需要有关。长期以来，我国的政治经济学及其影响下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始终是把生产关系，特别是所有制关系置于首要的位置，也可以说是十分重视制度因素的作用，同时也颇为重视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这也可能是中国学者在众多的西方经济学流派中，唯独对新制度经济学派容易接纳的原因吧！

据笔者所知，诺思的经济史理论在它的母国仍然是褒贬不一，颇有争论。一些美国经济史学家肯定其在研究经济增长的原因和西方世界兴起方面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体系，但同时也指出，要使这一理论得到确立还需要远为充分的证据。

从事美国经济史研究的学者都知道，诺思本是计量经济史学派的重要人物之一。他在研究美国经济增长问题上颇有成绩。代表作有《1790—1860年美国经济的增长》（1961年）、《美国经济史的数量分析》（1963年），可惜这些著作和论文至今没有见到中译本。后来诺思的研究转入美国经济增长的原因和西欧由传统化走向近代社会的转变，1971年与兰斯·戴维斯合作出版了《制度变迁与美国的经济增长》，同时还与罗伯特·托马斯合作发表了《西方世界增长的经济理论》、《庄园制的兴衰：一个理论模式》等两篇论文，提出了制度因素，亦有效的经济组织对经济进步起决定作用

如赵冈、陈钟毅著：《中国经济制度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一书就用产权理论研究中国土地制度的变迁；罗友枝在《竞争的市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障碍》（Evelyn S. Rawski, Competitive Markets as an Obstacle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见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编：《第二次中国经济史会议论文集》，289—313页（1989年）一文中，则运用交易成本的理论，作中外流通费用的比较研究。

的观念，认为技术创新、规模经济、资本积累等，亦生产力的进步，不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原因，而是经济增长本身。由上所述不难看出，诺思新经济史理论的提出是在弄清美国经济增长的实绩以后。我们在引进或运用一种国外的新理论和新方法时，必须注意到我们与他们所处的不同条件。否则，就有可能误入歧途，在没有搞清楚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真实状况、特别是没有起码的统计分析之前，即作出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判断，然后匆忙转入原因的分析，这正是我国传统经济史，乃至整个历史研究的重大缺陷之一。应当看到，我们对中国经济发展作因素分析的很多基本前提尚不具备。因此，在运用这种新的经济史理论的同时，千万不要忘记补上这一课。试想，如果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状况心中无数，还谈得到作因素的分析吗？如果我们对发展状况作出违背历史实际的结论，那么所作的因素分析还有什么价值呢？

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必须摆脱就经济论经济的纯经济倾向，断言政治因素，乃至文化因素的研究，迟早要被引入经济学研究的范畴。本书在撰写过程中考虑到这种意见的合理性，适当加强了这方面的论述，并试图将诺思新经济史理论中某些可操作部分，如产权理论、交易费用等，用来解释中国近代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某些问题。

所谓“制度”按照诺思本人的定义为“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服从程序和道德、伦理的行为规范”^①。也就是说作为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诺思认为价值观念、伦理规范、道德风俗、意识形态、社会习俗等都应包括在制度的范围之内。笔者认为，作为一种历史的研究，我们固然应当重视意识形态对制度形成的基础作用，它可能会对某种制度的贯彻执行发挥保证和推动作用，使经济得到发展；也可能与某种制度发生冲突，阻碍经济的运转。但是作为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 1991 年版 第 225—226 页。